

我的父亲胡风

晓 风

在父亲晚年，一次他深情地望着我对一位老朋友说：“她受的苦最多了。”

听了这话，我不禁心头一热，赶紧掩饰地说：“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其实，我的前半辈子所受的苦，与父亲母亲他们相比，那简直是差得太远了。不过，倒也经历过形形色色的磨难和坎坷，被这大时代的风雨所考验过。

我曾经粗略计算过，由于各种原因，我和父亲一起相处的日子，除去不记事的三岁以前，加起来大概也就十一二年的光景。但尽管如此，作为这样一个家庭的子女，半生的遭遇必然是和父亲的命运缠绕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因此，这篇回忆只能循着我前半生的轨迹说起了。当然，我对父亲的了解，除了耳濡目染亲身经历的，尤其是与他最后几年的相处外，多数还是从整理他的手稿、母亲所写的回忆和传记中得来的，这样一

来，很多情况总是要隔着一层。所以，这里写的与其说是我眼中的父亲，还不如说是我所了解的父亲。

我还要声明的是：我既无相当的能力和水平来阐述或评论他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也无足够的资料和档案来对“胡风案件”追根溯源、探明究竟。只能以自己的所知与理解努力为读者勾画出一个真实的胡风，一个活在我心中的父亲。



呱呱来稚女， 敌弹正轰城！
入世刚三岁， 堪时伴大人：
同灾经水火， 共义起风尘；
衣染车油迹， 颊留鼠齿痕；
方知癖气硬， 学语笑声频；
小别爹娘隔， 长程海水横；
太平洋战起亲子竟相分！

这里写的正是我的出生和童年时的情况。这是父亲为寄托他的感情在狱中默吟成的《怀春曲》中《善赞》的第一部分。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这中间，充满了苦难、眼泪和悲伤。而父亲的文学理论和主要的文学活动，也正是在抗战的艰难历程中发展成长的。在抗战期间，他创刊了《七月》和《希望》出版了《七月丛书》从而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上有所建树，并团结了一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成为“坚持抗日、坚持民主的一支文艺力量”（见《胡风悼词》）

还在娘胎里未见天日之际，我的磨难就开始了。

那是在从武汉撤退到重庆的逃难途中。父亲带着四岁的哥哥 挺着大肚子的母亲，一路颠簸，一路艰辛。最险的一次是在从四川万县转乘到重庆的船上。好不容易才买到了船票 可是船停靠在江心 人得坐着小划子靠到船边 再爬上三层的船甲板上。别人还好办 正怀着我的母亲怎能上去呢 最后 靠着父亲从上面拉 朋友从下面推 她用肚子靠着船舷才慢慢地爬了上去。还好 总算没伤着肚里的我 父亲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从武汉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很不顺利：买船票困难，上船费劲 在船上解决吃喝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千里江陵一日还”的一段水路，一直走了两个多月 三人才迈上朝天门那数不清的台阶来到了抗战时的文化中心陪都重庆。可是，新的困难又来了。当时的重庆 到处挤着从下江逃难来的人们，一时无法找到能长住的房子，父亲母亲带着我哥哥，只好在小旅馆里安顿了下来。

但是，由于路途的劳累，我提前出生了。那天，母亲的阵痛已经愈来愈紧 可是 尽管坐在滑竿上跑了一圈 医院里都没有床位能够接收她 最后 还是一位好心的女医生 看在与母亲同乡的情面上 主动来到旅馆里接生。不料 医生刚把我接生下来包扎好，还没来得及洗手，外面就响起了恐怖的警报声。吓得这位医生什么也顾不得，就匆匆跑出躲警报去了。只有父亲母亲守着刚生下来的我 无法躲出去。父亲坐在母亲的身边，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静静地等待着未卜的命运。他心里想的是 如果命中注定被炸中 那么 三人死在一

起吧。幸亏，敌机没有炸到我们的头顶上，在这场虚惊中躲过了这次劫难。

想不到几天后，我在小旅馆里，又遇上了另一场灾难。四川的耗子是有名的大且厉害。半夜里，它被我这个身上还带着乳香味的婴儿所吸引，在我脸上乱咬一气。母亲开灯看时，发现我已经是满头满脸甚至连被子上都是血。她和父亲赶紧用红药水处理了伤口，然后抱我上了医院。还算好，伤口没有感染，只是，至今我的鼻子下面还留有一条隐隐的痕迹。对这件事，当时重庆的很多文化人都知道，直到八十年代，艾青叔叔和葛一虹叔叔见到我时，还提起此事呢。

从这之后，靠着朋友们帮忙，我们一家人总算住进了一间西晒的小阁楼，不再住旅馆了。这时的生活既困苦又不安定。

到了重庆 父亲想继续办他的刊物《七月》。

这个刊物，还是在抗战初起时的 1937 年 9 月，他在上海创刊的。刊物为每周一期。内容主要是反映军民团结抗日的事迹和精神 其中有曹白、柏山、萧军、萧红的散文 胡风、艾青的诗，李桦、力群等的木刻等。由于刊物反映了实际的生活和斗争，不是空喊大叫，更不是虚假的故事和空洞的矫情，所以博得了当时正缺乏精神食粮的读者们的欢迎。每期刊物一出来，就被一抢而空。

只是，这个刊物在上海仅仅出了三期，就办不下去了。又由于战事越来越吃紧，父亲不得不将全家撤退到武汉。后来，朋友们也陆续来到武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大家的支持下，10 月 16 日，《七月》正式创刊 是为半月刊。阅稿、选稿、编辑、联系印刷发行、回作者和读者信件等诸项工作均集于父亲

一身 他为之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时间。在发刊词《愿和读者一同成长》中 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作家在这时代所肩负使命的认识 这也是他为什么不遗余力地编印此刊的主要原因：

……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喊，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 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跃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 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文艺作家的这工作，一方面将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一方面将被在抗战热情里面跃动着成长着的万千读者所需、所监视。……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正的理解者 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战斗里长成的新的同道伙友……我们愿意在工作中和读者一同成长。

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抗战时期，他所做的一切文化工作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 实践着他对读者的承诺。

到了 1938 年 7 月，武汉即将沦陷，《七月》不得不停刊了。刊物在武汉总计出了十八期。每六期合成一集 共三集。

从《七月》的编后记和父亲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八期的出版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敌机的不断轰炸，稿件邮寄困难，印刷出版条件恶劣；其次是国民党的多次留难，制造种种麻烦，甚至差一点被禁；再就是极度困难的经济条件，出版商的要求又非常苛刻，弄得稿费极低，更谈不上编辑费了。面对这种局面，父亲往往不得不自己贴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靠另外打工得到生活费。

这前三集刊物，主要是以通讯、报告文学和诗为主。战时生活变化急遽，许多生活还来不及被作家认识、消化、概括成小说或戏剧中的典型形象；只有直接描写战争生活和人物的

通讯报告及直接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诗方能起到积极的鼓舞作用。东平、曹白、阿垅(S.M 筹的报告文学以及艾青、田间等的诗差不多每期都有，且被读者所欢迎。另外，它还发表了大量反映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生活斗争的作品，歌颂了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普通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思想感情。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国统区的刊物，它居然冒着尽人皆知的风险，大胆地发表了报告文学《毛泽东断片》和《毛泽东论鲁迅》记录稿（毛泽东于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时在延安公学的讲演），更表明了父亲对毛泽东本人和鲁迅先生的崇敬。

每期刊物，他都要通过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到延安数十份。同时还通过其他渠道流入晋察冀、苏南、苏北等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共领导人对《七月》的评价甚高。1938年7月7日，父亲收到左联时的老战友刘雪苇的来信，内有一段这样写道：“《七月》十二、十三期均已收到并如数分送了。毛主席的回信说他座谈会记录已看了（当天来的信）很喜欢，希望以后新的经常给他一份。并表示感谢。我想这是你的光荣，《七月》的光荣，以后希望你一定经常给他一份。”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和谈，见到父亲时，还向他提到常看他的刊物呢。当然，父亲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几年后他竟会成为毛泽东的阶下囚。

父亲还应俞鸿模的海燕书店之约，选编了艾青的《向太阳》等书贯以《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之名予以出版，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影响。

从武汉来到重庆后，父亲不断收到朋友们的来信来稿，盼

望着《七月》的复刊。这是鼓励 也是鞭策。抗战文艺中不能没有《七月》 读者需要它！

可是，《七月》的复刊仍是困难重重 找出版商 编稿 送审，送印刷……等等，每一项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除了母亲帮他做一些事务工作外，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他一人在做。时逢酷暑盛夏，为了办好刊物，父亲只能奔波在火炉一般的重庆的大街小巷里。

忙乎了几个月 直到 1939 年 7 月 在停刊了十一个月后，《七月》终于复刊了。

复刊后的《七月》 扩大了内容 增加了篇幅 改为月刊。诗仍是父亲偏爱的重头部分，报告文学则逐渐被小说所代替。他善于从投稿中发现文学新人，尽量起用他们的稿件。为了让这些幼苗能够茁壮成长，他愿使刊物成为一片沃土。这时 除武汉时期的‘老’作者曹白、柏山、绀弩、艾青、田间、丁玲、S.M 等仍继续为刊物撰稿之外，读者们又见到了一些新的面孔 彭燕郊、鲁藜、孙铤、何剑董、路翎等。后来 父亲和路翎、阿垅还成了好朋友。《七月》的个性越来越鲜明 作者们渐渐地形成了后来被称为‘七月派’的一个作家群体，《七月》也成为活跃在抗战时期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之一。

由于《七月》明显地倾向中国共产党和它在青年中所起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敏感且早有所察觉。1941 年 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在给国民党中宣部的函件中就这样写道：“《七月》企图透过文艺形式达到谬误宣传之目的，本会审查该刊时向极严格，总期设法予以打击，使其自动停刊。”正如国民党书审处所言，他们对每一期的稿子的审查都特别严格，那些揭

露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和不积极抗日的文章，都遭到了不予放行的命运。因此 每出版一期《七月》都是一场紧张激烈、斗智斗勇的战斗，更不要说在经济上还要被出版商挟制与盘剥了。

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在北碚的复旦大学任教。开始，全家住在重庆城里，抗敌文协的工作也在城里，因此，他又得经常奔走于碚渝之间，在路上不知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战时大学教授的薪水并不足以养家，他只好又在国际宣传处做些工作，主要是收听并记录敌方的广播，为对敌宣传广播写稿，并选译敌方报刊中可供参考研究的时论，这样，有了那儿的一百元月薪，家里的生活才得以勉强维持。

在武汉时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抗敌文协”），父亲在那里负责研究部的工作，他经常组织和主持一些活动如诗歌座谈会、诗歌晚会、戏剧晚会、小说晚会和各种纪念会。尤其是每次的鲁迅逝世周年活动，他更是全力以赴，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把纪念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在我出生的 1939 年，敌机对重庆的轰炸十分猖獗，仅“五·三”“五·四”两次大轰炸，平民百姓便死伤无数。为了全家的安全，父亲将家搬到了北碚黄桷镇帅家坝的两间小破房里。这两间过去一是羊栏，一是厨房，当时的隔壁仍是猪圈。夜间，能听到猪叫声，还一阵阵地传来猪食和屎尿的臭味。让家人和幼小的我住在这样的地方，父亲真是于心不忍啊，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但即便住在这样艰苦的地方，仍躲不开敌机的轰炸。第二年 1940 年的 5 月 27 日我们的住处周围落下了三个炸弹、两个杀伤弹。窗户的木条被弹片削断了，还有一

个弹片正从卧房中穿过，然后又飞到隔壁人家的衣柜里。幸亏我们躲得快，没有死伤。但是北碚和复旦的损失很大，教务长孙寒冰被炸死，还有一些人被炸断手臂。在这种情势下，我家只好又从帅家坝迁到了石子山，住进了通俗编刊社留下来的三间土屋。不过，这里也并不安全，仍然时常要躲轰炸。

这时父亲在国际宣传处里由于不买那些官僚们的账而受到刁难，最后他只好辞职。又由于他不肯加入国民党，在复旦大学那里也受到压力，最后，被迫辞了职。失去了这两个工作，他也就完全失了业，没有了收入。幸亏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政治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经周提名，父亲成了专任委员，总算解决了全家的生活问题。几个月后，粮价暴涨，买粮又成了难事，专任委员这一职务得到的几十斤军米填充了无米之炊，解决了大问题。

这里还要补充说说父亲接受周恩来领导的情形。

在武汉时他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周就与父亲作了个别的恳切的谈话。父亲感到很亲切，无拘无束，便将自己在上海时和周扬等人的矛盾和自己的想法全都坦诚地对周讲了，周则扼要地分析了那几年上海文艺领域的情况，肯定了父亲的工作。周和他谈了很久，父亲的心情舒畅多了。这之后，凡有周或其他领导人与文化界人士的集会或谈话，都会约父亲参加。有时父亲还要为周和日本友人的谈话作翻译。父亲有事也会来找周的秘书、自己在左联时的老战友吴奚如，从他取得指示。所以说，父亲的工作主要是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到重庆后更是这样。父亲和周身边的陈家康、徐冰、乔冠华等人也成了好朋友。

尽管要应付这么多不断出现的问题，又这么辛苦，他往往要到半夜才睡觉，第二天还要出去跑。生活是那样紧张劳累，但父亲的内心是充实的。看到读者表达对《七月》热爱的来信，看到来稿中陆续出现的新人新作，他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同时，他还要抽时间写文章。在这一时期，写的评论除集成了一本《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后改名为《剑·文艺·人民》）外，还写了一个长篇论文《论民族形式问题》。这是针对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的，是他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影响也比较大。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是由向林冰等人在这时提出来的。

他们的中心论点是：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而“五四”兴起的各种革命新文艺只是移植形式，是“副次”的地位。他们强调大众化，强调文艺形式要适应广大农民的“习见常闻”和“喜见乐闻”。而父亲则认为“五四”新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正宗的，民间文艺形式只能起“帮助”的次要作用。他强调“人民大众”“习见常闻”和“喜见乐闻”的应该是“生活里存在的隐藏着甚至是原来常常被大众自己拒绝的、战斗的欲求。前者必须服从后者。进步的文艺所评价的、所要求的、所应高扬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认为要“为提高大众的认识能力而斗争”，“不能同意把民族形式还原为大众化或通俗化”。

由于论争必须要提到某些人的论点，他在文中提名道姓地引用并批评了他们的观点，如周扬（和周扬的恩恩怨怨是早

在三十年代就种下的，下文中还要专门提及）、艾思奇、胡绳、何其芳、陈伯达等共产党的理论家。从而被人们认为他太狂妄 这就种下了继三十年代以后的又一个祸根 于是“反对民族形式”也就成了他的又一大罪状。

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后人曾这样评论过这场论争：“从当时的政治角度看 要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励，‘旧瓶装新酒’和通俗化、大众化便是十分重要甚至首要问题。”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说实际是这次论战的结论。尽管目标并不一定是胡风，也远远不只是论‘民族形式’，但其精神实质和基本倾向，却与胡风恰好是对立面”。毛泽东“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 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来规范和要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因此，在《讲话》占据文艺工作的指导地位数十年来，“强调民间形式和传统形式 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胡风虽然强调现实主义 强调生活、斗争 强调从内容出发 但他多半是从文艺自身特殊规律来谈论的（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看来 仅在“民族形式”这一问题上 当时正领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就对胡风有了看法。

这时，我正处于牙牙学语的时期，虽然环境恶劣，有时连米饭都吃不上 但在乡下的田野里跑着 躲着轰炸 吃着红苕，倒也长得白白胖胖。父亲只能在回到家里短暂休息时尽可能地多抱抱我，关心关心我。

1941年年初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那种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让一批文化人撤离重庆，不同国民党合作，以表示抗议。文化人中有一部分去延安，另一部分则去香

港。经考虑，周恩来决定让父亲去香港。

早在一年多以前，董必武老先生从延安来就曾给父亲带来了周扬的一个口信，说是请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中文系主任。他虽然十分向往延安，还在《七月》上发表过不少反映延安和革命根据地生活的作品，包括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的作品，可是由周扬出面来邀请，其用意何在让他摸不清，更何况还得放弃掉这边的《七月》，这是父亲所不愿的。他向周恩来作了解释，说延安人才济济，何必再挤进去呢？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揭穿一下他们的鬼脸也是好的嘛！周同意了父亲的看法，并说：“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于是便由周出面向延安方面做了说明，留下了父亲。但母亲还是很想去延安参加正式的工作，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做动身去香港的准备。

赴香港之前，周恩来亲自为我们一家做了路上的安排。除了办事处的同志知道外，父亲只告诉了老舍一人，他相信老舍的为人和对他的友谊。两人互相道着珍重告别了。

5月7日凌晨，我们全家从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搭乘一辆运货车，离开了重庆向南驶去。母亲带着两岁半的我和不到七岁的哥哥挤坐在司机台里，父亲则高高躺在敞篷的货堆上。到了贵阳，又乘公路局的运货汽车到广西宜山，再从那儿坐火车到柳州。后来又坐电船、木船，甚至牛车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经受了各式各样的危险和磨难，尤其是我还经常哭闹，可给父母带来了不少麻烦。就这样，历时近一个月，才到达目的地香港。

在香港住了几天后，发现这里简直是米珠薪桂，加上言语不通，对伙食不适应，我这个在乡下住惯了的小孩，在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玩的地方，因此，常常吵闹。尽管组织上一再表示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帮着解决，但母亲还是决定带我和哥哥回上海，以减轻父亲的负担，好让他安心写作和编书。在战乱时期骨肉亲人无奈分开，当然是下策，但非常时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到了沦陷中的上海后，生活虽然安定了一些，但哥哥由于几年来的营养不良，肺部有了感染。医生嘱咐母亲，两个孩子最好隔离开来。无奈，母亲只好将我放在上海的外婆处，并进了基督教女青年会办的托儿所，自己则带着哥哥又回到了香港。等哥哥的身体稍好些，再到上海接我回香港。

可惜的是，事与愿违。母亲和哥哥刚刚来到父亲身边，没过几天，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香港沦陷。这样，我和父母分开了四年多，直到抗战胜利，他们复员回到上海，才和我团聚。

香港沦陷后，他们三人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其他文化人一起，逃离了香港九龙，在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辗转惠阳、老隆、曲江等地，最后于 1942 年的 3 月 6 日才安全到达桂林。

在这时期，外面的传闻很多。有人说“胡风在香港投海‘就义’”还有人为他落过泪，萧军甚至特意写过一首悼诗。但是，更多的朋友相信他“一定活着”，不会遭难。可恶的是，反动的小报《良心话》竟造谣说“胡风附逆”并有“铁证”等。一时间各种传言接踵而至，甚嚣尘上，真令亲者痛仇者快。父亲到桂林后，立即写了《死人复活的时候》。在愤怒驳斥了可卑的谣言后，他坚定地说：“对于因为这谣言而或者气愤或者着急的友

人们，我当然由衷地感激，但我自己却只有厌恶，而且在厌恶里面还经验到一种另外的心情：觉得我确在这人间活过，这出自对于我的憎恨的谣言就是明证。那么，现在我回来了，回到这我曾经活过的祖国来了，回到这战斗着而且为了战斗而苦恼着的祖国来了，我要努力认真地再活一回。”

他要弥补失去的时间，加倍地努力工作。

他先是为新知书店编了《山水文艺丛刊》第一辑，书名用的是回桂林后写的文章标题：《死人复活的时候》。第一辑出版以后反响很大，只是第二辑虽已编好却不能出了。好在是，由于他的回击，《良心话》也不得不停了刊。

青年学生朱谷怀、朱振生和米军、林紫爱好文艺，也喜欢写诗。两人筹了点钱想办个出版社，并将出版社定名为“南天出版社”。他们找到父亲要他们介绍图书出版。父亲想起了《七月诗丛》就编了艾青的《向太阳》、冀沅的《跃动的夜》、孙铤的《旗》、阿垅的《无弦琴》和胡风的《为祖国而歌》为第一辑。出版后销路不错，父亲又接着为南天出版社编了下去。其中有新生作者的诗集《我是初来的》和他自己翻译的论文集《人与文学》等。难的是书审处卡得太紧，往往以“有鼓吹阶级斗争之嫌”、“不合抗战需要”、“触犯审查标准”等为由查禁送审的部分书稿。父亲自己的一本评论集《密云期风习小纪》被删去了五篇后仍没通过，鲁藜的诗集《延河散歌》不得不改名为《醒来的时候》，又给检查官送了礼才勉强得以通过。有时还得将字句修改得隐晦曲折，或先按要求删去一些内容到印刷时再偷偷加进去。而杜谷的诗集《泥土的梦》和何剑薰的一篇讽刺小说不但没能通过，连书稿都被没收了。

由于重庆国民党政府方面一再表示希望曾经出走的这些文化人“捐弃前嫌”，回去工作。为了统战，中共中央也这样要求他们。于是，在桂林过了一年多后，我们一家人在组织的安排下于 1943 年的 3 月，又踏上了返回重庆的路程。

离开了近两年，重庆没见有什么变化。父亲又见到了阿垅、路翎、何剑薰等友人，后来又认识了化铁、绿原、冀沅、冯白鲁、吕荧等文艺青年。“七月派”的队伍壮大了。

他继续从事抗敌文协及文工会的工作，仍参加和主持文协和文工会的各种座谈会、讲演会和历次的鲁迅逝世纪念会，工作十分繁忙，还有难以摆脱掉的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在 1944 年的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上，来了二三十个特务在会场上捣乱，他愤慨地怒斥特务，反击他们的阴谋企图，遭到了他们的围攻。后被朋友拉出了会场。

最紧迫的事自然是重出《七月》了。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事。办刊物须领取登记证重新登记，还得有三万元的保证金。这笔钱对父亲这样的穷文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了。最后，还是他去找了周恩来，由周开了张支票，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刊物定名为《希望》。希腊神话中说，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飞出了各种祸害，只剩下“希望”和“幻想”留在盒子里来不及飞走。将“希望”作为刊名，表示他们面前只有“希望”和“幻想”。但即使有了保证金，后面还有好多麻烦事需一一去交涉通融，简直是每走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直至 1945 年的元旦，这《希望》的第一期才得以问世。《希望》从筹备到创刊共历时一年零九个月，被父亲形容为如同一只小蚂蚁爬过杂有乱石、树根的小水沟一样艰辛。

《希望》和《七月》相比 篇幅扩大了好多 也不再是纯文艺性的刊物了。文艺作品中增加了小说的比重，差不多每期都有路翎的小说；诗自然还占有重要的位置；除此而外，增加了一些思想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评、杂文等。如舒芜的《论主观》、《论中庸》等和路翎、冰菱的书评等。由于一些书评文章措词激烈 招致被评的作者对胡风和《希望》的不满甚至忌恨 长期不能消除。尽管这样 这本新颖大胆、内容丰富的刊物 还是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往往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进步文艺界的地位更高了。

《希望》第一期 因为发表了舒芜的论文《论主观》 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但其影响远不止此，多少年来，发表《论主观》成了父亲的一桩主要错误和罪行。人们将这篇论文中的论点等同为胡风的观点，一起批判。

舒芜本来是路翎的同事和朋友，路翎将他介绍给了父亲。父亲出于对路翎的信任也就对舒芜很看重。舒芜为人聪明，有才学又很健谈，在谈话中会很迎合对方并博得对方的好感。父亲曾陪他去和陈家康、乔冠华他们讨论学术问题。后来他拿来了《论主观》和《论中庸》两篇论文 希望发表。本来 父亲编的刊物是不发表哲学论文的，这篇论文在他的抽屉里放了近半年，既无法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在这之前，《中原》和《群众》两个刊物为了响应延安整风，登了几篇探索哲学的文章，如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和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 结果被认为是犯了唯心论的错误，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一时间空气很沉闷。但因为这是党内的批评 父亲并不知晓。当时 父亲想用舒

芜这篇文章引起争论，借以打破沉闷空气。为了使读者能够明白他在编后记中还特意说明：“《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但如果能有多少的启示，使读者从这些以及正文引出讨论的端绪，我想，受赐的当不只是作者一人而已罢。”在这里“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是指的延安整风运动说的。说“再提出”是指《中原》和《群众》都已提过的。可是后来的批评者却认定胡风是向读者保证，《论主观》这篇文章本身重要到“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而将后面所说的“不要轻易放过 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轻易放过了。这个“误解”也太大了。本来，《论主观》在《希望》上发表时后面还有作者约千字的附录，也谈到路翎和胡风对该文的不同意见，但批评者都好似没看见这一附录，避而不提，到后来，在编印供参考用的批判文集时竟干脆就把它“略掉”了。

在这一期里，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是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在这里，他提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文艺的要求 反对文艺中表现出来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不久延安就传出了这样一个说法 胡风用“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把板斧砍倒了许多好作品 砍伤了许多好作家……

在冯乃超主持的一次文艺座谈会上，由茅盾、以群等人带头批起了《论主观》。实际针对的是胡风的文艺观点 将舒芜的“主观”和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混为一谈。胡风所批评的“客观主义”茅盾心中明白是指他的作品 因此也在借机反击。结